



董木兰 著

YUWAISHILING

域外 拾零

开卷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开卷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YUWAISHILING

域外拾零

董木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拾零/董木兰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5

(开卷)

ISBN 7-5326-0951-0

I. 域... II. 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705 号

责任编辑 郑利平 曹勇庆

装帧设计 姜 明

辑封设计 杨钟玮

版式设计 任欣伟

域 外 拾 零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1 字数 233 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26-0951-0/B·23

定价: 18.50 元

小妹,我为你骄傲(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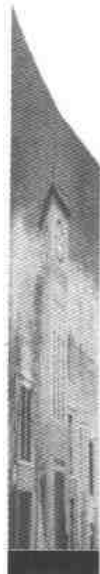
董鼎山

我常以为在我们五个兄妹中,以小妹木兰的进取心最大。她如果设定一个目标,专注争取,没有不会成功的。这本新书的出版便是明证。我并没有举手相助,她的构思、写稿、发表、出版,都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

我与她在生活上有五十余年的隔绝。1947年我出国赴美留学时她不过15岁。我常常臆测,那时她如与我一起出国将会有如何的发展。1978年我初度返国时,她已是育有儿女的中年妇人。逢面后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文革”艰苦时期在她脸上留下了深深痕迹。这些痕迹(与上了年纪的皱纹无关)当可因这本新书的出版而消失。她的开颜给我喜悦,她的成就令我骄傲。

她在幼时是母亲的宝贝,兄长们的宠儿。我在海外常遗憾我们兄妹之间亲密关系的被剥夺。近二十年来的经常联系不能弥补这类感情上的缺憾。所幸的是她的进取心的取胜。靠她自己努力的推动,她促成了女儿伍光艳(小名咪咪)在学业上的成就——牛津大学数学硕士。我还记得我与妻子先后数次在苏格兰与伦敦带着咪咪出外进宴时的高兴与骄傲。

作为母亲的她,骄傲当然更不可言喻。完全靠她自己的努



小妹,我为你骄傲



力,木兰访游了欧洲各地。在工作时(她充当出国访问代表团翻译)她到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典、挪威诸国。后来她又自费探亲旅游,去过英国、美国、墨西哥、新加坡等。她与英国(特别是苏格兰)的因缘是传奇性的,她把女儿造成牛津大学高材生更是英雄性的。这本集子所讲的就是这些故事,我不必在这里赘述。令我(作为一个作家)所最惊异的是她不但在天津报上投稿发表,而且也在苏格兰一份地方报投书见报。十年前,在那个名叫 LANARK 的小城市,她是一位“名人”。因为女儿在当地就读的关系,她前往探亲小住,与当地居民结下了牢固的友谊。我与弟弟乐山常说,只有她,才有胆量与毅力做到这些。

另一件令我惊异的事是她在天津举行老年人时装表演会的成功。我记得她在幼小时即对时装设计有兴趣,不想这项天生才能于趋近老年时才发挥出来。

我对在生活上隔离了半个世纪的妹妹太少认识了,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不但可以帮助读者们认识董木兰,也可加强我对她的了解。老友沈寂助成了我妹妹的终生愿望,我要特别在这里向他致谢。

2001 年 7 月 16 日于纽约

木 兰 小 传

董木兰

我于1932年阴历正月廿日卯时出生于浙江宁波，木兰这个名字，是我出生后不久，祖父给取的，他对母亲说：“就叫她木兰吧！”没过几天，他就去世了。

祖父是屠夫出身，后来为一个德国颜料商看仓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颜料商仓皇逃回德国，把仓库中的颜料全部给了祖父。于是，祖父发迹了，赚了钱，在宁波江北岸买了地皮，盖了两进两层楼的房子。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每个儿子可分一进房子，而女儿则是要泼出去的水。

祖父从此大做慈善事业，他要回报给穷苦人家。在我家前面一条通向乡下的小河岸边，祖父盖了一座非常大的凉亭，被称为“新凉亭”，专供过往行人、苦力和小河上的船夫歇脚。他还在我们宁波乡下老家一座山上盖了一座庙，供老乡们上山烧香敬佛。祖父慈悲为怀的精神，传给了他的儿孙。

祖父的大儿子——我的父亲继承了颜料生意，在市内开了一家颜料店，起名“董顺记”，是想一切顺顺当当的。可是，是不是一切都顺当了呢？我的母亲是父亲娶的第五个填房。前面四个，都是在生头胎时，因难产死亡。母亲生我的大哥时，也是难产，是医生



用夹钳夹出大哥的,才使母子平安。母亲一共生了五子二女,第二个女儿和第五个儿子,都在小时候得脑膜炎夭折,因为当时没有特效药。母亲42岁时生的我,正如宁波人常说的“四盆子一碗汤”,即我前面是四个哥哥,我是最小的独生女。

我始终纳闷,祖父当初怎么会想到,给我取一个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的名字。难道他希望我能像花木兰一样的勇敢和有所作为?

在家里,大家都叫我木兰。上学时,我的学名叫雯英,那是住在一起的、比我大10岁的堂姐给取的,因为她叫赞英。

我的四个哥哥的家名和学名,都是祖父给取的。因为他在老家山上盖了一座庙宇,他又要普济众生,于是四个哥哥的学名是:南山、鼎山、乐山和名山;家名是:济源、济渭、济泚和济泉。

1941年我9岁时,因为大哥在上海结婚,二哥和三哥在上海读书,于是父母亲带着四哥(我自小从不叫他四哥,只叫他的小名阿宝。他上初中时向大家宣布,大家必须称呼他学名——名山,否则一概不应,大家都顺从了)和我,举家迁到了上海。我们租了一幢位于爱文义路西摩路口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的二层楼,一间作大哥的新房,一间由我们六人挤住。

到了上海后,二哥给办理手续,四哥和我进了离家不远的小沙渡路上的美国教会学校——培成中小学。我上三年级,名山上四年级。

记得我在培成上初中二年级时,一个春天的星期日,我一个人到戈登路上的美琪大戏院看周璇主演的电影《鸾凤和鸣》。星

期一早晨下着小雨，该去上学了，我向母亲说我不舒服，母亲却认为我是想赖学，逼着我去上学。二哥看出我不是装病，就求母亲别让我去学校了，而应陪我去看病。母亲就叫了一辆黄包车，带我去麦特赫斯特路上的俞伴梅医生——这是我们的家庭医生诊所。俞医生诊断我是伤风感冒，给了一些治伤风感冒的药，母亲和我又坐黄包车回了家。这以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星期三下午，我才在一家医院的小阁楼病房里睁开了眼。母亲坐在病床旁，喊着站了起来：“她睁眼了！她醒过来了！”医生急忙进来，我看他是个外国人，站在床前，伸出三个手指问我是几个。我知道是几个，但是没有出声。他又问我：“英文 simple 怎么拼？”我知道是 s, i, m, p, l, e 六个字母拼成，但是我懒得开口，没有理他。他向母亲摇摇头说：“她的脑子坏了，这是脑膜炎的后遗症……”我只见母亲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后来二哥来看望我，安慰母亲说再观察几天。他们讲的话，我都听得明明白白。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身体逐渐恢复了过来。出院时，德国医生很得意地对母亲说：“这是奇迹，患脑膜炎的生还者中，百分之九十九都可能呆傻，成为废人。你女儿是那百分之一的幸运者，竟然恢复得像正常人一样，真是少有！”

我回家继续休息了一个月后，才回到学校，仍在原来的班级。复学第一天，我上课迟到了。老师当着我的面对同学们说：“董雯英的脑子坏了，连上课都记不得了。”很长时间，同学们都把我当傻子看待，躲避着我。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通过用功学习，我把耽搁的两个多月的课程都补上了。期末考试的好成绩，证明了我并不傻，脑子没有坏，一切正常。除了那个星期一上午至星期三我睁眼醒过来之前那段时间我全然不知以外，过去的事我都能回忆起来。

后来听母亲说起那段时间，我才知道，那个星期一上午 10



点来钟,母亲带我看完病,坐黄包车回家时,我已不能自己上楼,是二哥背我上的楼。二哥把我放在床上后,去了学校。母亲唤醒我吃粽子,我没吃几口就呕吐了。然后是昏迷不醒,似睡非睡。直到中午,二哥不放心,回家看我,觉得不对头,立即抱了我,叫车送到上海唯一一家德国人开的传染病医院抢救。经过抽骨髓,诊断为脑膜炎。医生说,如果再晚半小时,我就没救了。所以,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二哥给的。病愈后,我和正常人一样,一直到现在年近古稀,在写这篇小传时依然如此。我相信,我还能健康地活下去。

1947年二哥考取自费留学美国,进密苏里新闻学院读硕士,后来再读图书馆学学位。他退休前,大部分时间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他娶了一个很贤惠的瑞典妻子,有一个美国籍女儿。

1949年上海解放那年,我考取了美国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因为这所私立大学的学费太贵,我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辍学在家了。那时,三哥乐山已在北京新华社对外部工作。这年(1950年)10月,他写信来叫我去北京,说“参加革命才是出路”。就这样,18岁的我离开了父母,只身坐火车去北京,记得离家时,是名山和我坐了一辆三轮车去的上海北站,三哥的好朋友叶明(著名电影导演)还到车站来送行,给了我一把香蕉路上吃。从那时起,我就叫董木兰了,董雯英的名字再没用过。

三哥把我介绍给他的好友冯亦代安排工作,冯是国际新闻局的秘书长(局长是乔冠华,副局长是刘尊棋)。国际新闻局在宣武门国会街,与新华社总社在同一个院子,这儿就是以前的国会旧址。冯亦代把我领到新闻处校对组,在放着一台英文打字机的桌前,要考考我的打字能力。我以前在家时,曾在三哥的手提式

英文打字机上自学成才,每分钟能盲打二百个字符,自认英文打字没有问题。可是,现在面对眼前这台从未见过和用过、看起来厚重复杂的英文打字机,我的手指就不听使唤了。短短一段英文新闻稿,我却打得错误百出。校对组长李琴(后来曾任新华社副社长)是内行,看得出我稍加练习,就能胜任英文打字员工作,所以把我留在了她的组里。从此,我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国家干部。

新闻处是当时国际新闻局中,最大最主要的部门,主要的工作是对国外编发新闻稿。半年后,李琴看我英文不错,又让我做中英文的校对工作。新闻处里的工作程序,大致是:编辑负责把中文消息翻译成英文——外籍专家(当时有美国来的 Alan, 英国来的 Michael 和 Springhall)审核语法和修辞——校对组进行中英文校对——外籍专家审核——主编审定——校对组打字——分发。

其中的一份,要送给对外广播组,他们在下午5点到中央电台对外广播。当时广播组组长是林达光(后来去加拿大,任麦吉尔大学教授),组员有方矩成和姜桂依夫妇(从英国 BBC 回来,周总理去世后,他们夫妇合著有英文《周恩来传》)、周瑛(美丽的英国女孩,英文名 Esther Zhou,嫁给起义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和我同岁,曾同居一室,我们成了好友),还有林达光的夫人陈恕。

当时新闻处的领导是陈龙(“克什米尔号”飞机事件牺牲)、沈建图和郑德芳。众多的编辑中,现在我还记得的有:彭迪和钱行夫妇、黄龙、张怡(李慎之夫人)、陈封雄、曾建徽(后来曾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人大新闻发言人)、李平(“克什米尔号”飞机事件牺牲)、张壁华等。多数编辑是从老解放区进城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过去投奔革命的原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的进步学生。此外,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向往革命从海外回国和

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

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真是充满了欣欣向荣的革命朝气，人人都自觉努力工作，要求进步，团结友爱，艰苦朴素，与人为善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级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确实像一个革命大家庭，感觉到温暖。我很兴奋成了革命干部，对生活待遇从不考虑。我每月只有大灶包干制 270 斤小米（合 13 元 5 角）生活费，用这点钱在干部食堂一日三餐也足够了。另外，冬天发一套棉制服，夏天发一套单制服和一顶蚊帐。到了周末，冯亦代、安娜夫妇会叫我到他们家吃饭解馋，三哥会请我到西单的小饭店改善伙食。

我在国际新闻局里，先后参加了当时在全国掀起的各项政治运动，如打击反革命分子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忠诚老实运动等等。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每人必须向党交心，坦白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为了向党表示忠心，我交代了我有个哥哥在美国，我要和他划清界线。于是，我在组里宣读了我写给曾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二哥董鼎山的信。信中主要内容是说，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工作，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你再也不是我的亲哥哥了。

我不知道二哥接到我这封绝交信后感觉如何，从这封信后，我和他一直未通信。直到 60 年代节粮度荒岁月时，他惦记着我们全家，几次托人从香港给我的三口之家寄来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又救了我一命。当然，同时他也寄食物和汇款给其他亲人。

1951 年 5 月 1 日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中，我和当时在国际新闻局人事科工作的伍文煦认识了。他和我一样同年读了一学期新闻系（在燕京大学），被国际新闻局招聘来工作。他是当时西

南各省统一高考中唯一被燕京大学录取的学生。因为他是团员，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学生运动，政治上可靠。他本来是招聘到由朱启平担任主任的资料研究室工作，因为人事科需要政治上可靠的人担任机要工作，他就在人事科科长康大川领导下工作了。

我们恋爱了。我们所在的两个部门的同事们都非常赞同。因为他是青年团员，思想进步，能够帮助我进步，帮助我这个从上海来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孩子改造。有一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给我看：“我要你作我的妻子。”我点头同意了。

我们结婚了。当时结婚要征得领导同意，刚好局里另外有两对青年也要结婚，局领导就安排我们三对在1951年12月31日晚上举行集体婚礼。婚礼在新华社大食堂举行，由副局长刘尊棋当主婚人，冯亦代当司仪。典礼后是年终聚餐，然后是舞会，全局一百多人，弄得热热闹闹。

新房就是他原来与人合住的那间平房，现在由局里分配给了我们。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只脸盆架，我把单身宿舍中自己的铺盖衣物搬来，就这样结婚了。当天下午，我们还肩上挂着冰鞋，去北海滑冰。张壁华代表新闻处送我们一张红双喜剪纸贴在新房墙上。除了这张喜庆的剪纸外，曾维祺送的一对翠绿色茶杯是新房中色彩最艳丽的东西了。

结婚照片是头几天去西单一家照相馆拍的，他仍旧是平时穿的那身灰布干部制服，我上身穿的是三哥借我的浅色毛料制服。

新郎新娘穿了这样的衣服，再在外面套了公家发的粗灰布棉制服，脚穿粗布棉鞋，就在婚后第二天坐火车回娘家了。

来开门的是母亲，看见我们这一身打扮，看着那已不是穿着长旗袍的女儿时，母亲扭头躲到客厅后面的厨房里哭了，父亲也

说不出话来。我自己倒是很得意，因为我们两人都是革命干部。

母亲在家办了两桌酒席表示庆贺，阿姑送我一块肉色湘绣缎子被面。亲戚都分别宴请了我们，送了礼物。我们还去杭州度了三天蜜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方面是生源缺乏，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干部，决定抽调部分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年轻干



1952年木兰夫妇与四哥(左)

部，到大学学习。这就是所谓“调干生”。

我和伍文熙当时才20岁，自觉学识不足，便向局领导提出申请，得到了同意。因为当时俄文干部少，领导要求我们学习俄语专

业，将来既懂英语又懂俄语，毕业后仍回新华社工作（此时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局，新闻处并入了新华社）。

我们先在北京大学干部补习班补习高中数理化课程三个月，由于我们俩的成绩优秀，学校动员我们放弃俄语专业，改学理工科。于是，经过高校入学统一考试，我们俩被保送进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已改名北京理工大学）。这个学校的前身，最早是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解放后，逐步发展成现在的兵器工业高校。我们都被分配在火炮设计与制造专业，教材几乎全部来自苏联。我们分住在男女学生宿舍，却同在一个教室里、同一张书桌上上课。

由于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军事保密大学，学校要对每个学

生进行政审。第一学年后,有一些同学由于家庭或社会关系的原因,便被非自愿地转学到北大、清华、天大、南开、浙大、华中工学院去了。有一天学校政工干部找我谈话,要把我转学到清华大学建筑系。这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又有董鼎山这个海外关系,所以不能在极度机密的大学学习。我立即拒绝了一个人去清华。我对他说:“伍文煦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后来我竟被非常例外地留了下来,但是我和同学们都明白,我是被列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学生。譬如,到了二年级结束,我们班去南京的解放军炮兵学校实习,只有我被排除不准参与。到五年级进行毕业设计时,全班分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两大类,分别约占人数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我被分配在工艺设计类的课题,而政治条件好的都分配在产品设计课题。又譬如,我在一年级时就申请加入共青团。在班级团支部的讨论会上,有位团员竟然说:“董木兰申请加入青年团,就好比反革命分子转正一样。”结果,大部分人投了反对票,原因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根本转变和有海外关系。

这两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得我心情一直非常压抑,我更加努力改造思想,处处以共青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发光发热。这样,终于在五年级时被通过入团了。那年我已 25 岁。

大学五年级毕业前夕,1957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全党整风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向共产党提意见,以便改进共产党的作风。已是共青团员的我,当然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我写了一封信给系党总支,给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提了些意见,希望在我们毕业前夕,帮助她改进,让她轻装去工作岗位。信末我说我不敢具名,怕她报复。伍文煦并不知道我写了这封信,直到系总支把我的信和总支的回信,交给当时在班上当宣传委员的伍文煦时,他才知道。根据系总支的要求,两封信同时在黑板报上贴了出来,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关注,系总支的回信鼓励我积极向党提

意见,如有打击报复,总支负责。

不料,我的信触动了班党支部书记,也是后来我和伍文煦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导火线。

“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伍文煦成了班上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因为他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替班上的肃反对象解脱(后来事实证明伍文煦是正确的),被批判有所谓“右倾思想”,现在鸣放会上对此事旧话重提;又因为他在整风运动初期,在班上的鸣放会上,曾说过: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把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任意摘录和刊载私人信件,是不合理不合法不民主的……因此,他成为班上头号批判对象。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同学们也逐渐和我疏远,最后我们两人被彻底孤立。而且就在伍文煦被打成“右派”不久,在对共青团进行所谓“整理队伍”时,我也被“揪了出来”批判。批判原因不外乎我有海外关系,对支部书记不满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伍文煦划不清界线而夫唱妇随……

1957年毕业前夕,我们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毕业后



1957年五一节

长期不予分配工作,没有人理睬我们。同班其他同学,都兴高彩烈地分别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因为我们所学专业是火炮设计和制造,所以同学们都被分配到保密工厂、研究所或大学,全班只有我们两人留校,等候发落。当时我们心情沮丧之至,前途渺茫,也无法向家人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两人被开除团籍。真是没有料到,我从大学一年级就

积极申请入团,直到五年级上学期才被吸收。可是不到一年又被清除出来。

眼看同学们一个个欢天喜地地离开校门，几乎没人来同我们握手告别，因为我们已同他们不一样了，被打入另册了。空虚、孤立、无助、绝望、自卑的感觉，充满了我的脑子。我们两人常常无言以对，可又不愿表露出来，怕彼此受到坏情绪的影响。就这样，我们住在已走空了的学生集体宿舍里，等候党的发落。

其间，我们仍然有入学时就拿的每月 24 元调干生助学金。与此同时，我的家里却在盼望学成业就的好消息。我只能写信欺骗父母亲说，我们两人留校当助教了，每月工资是 48 元（24 + 24），我因有肺病暂不工作，暂时还没工资，所以就暂不能寄钱孝敬父母了。我确实不忍心把我们被打成“右派”的事和未分配工作的事告诉他们。因为，我们已被伤害得连自杀的念头都有，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把刀，插进他们无辜的心上呢。所以，我的父母至死都不知道他们 18 岁就离家，北上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儿还有女婿，竟然成了世人唾弃、不屑一顾的、低人一等的政治上的“贱民”。

在留校的半年里，学校政工部门曾多次要我们在“所犯的罪行”上签字认罪，被我们拒绝了。我们很郑重地对他们说，我们没错更没罪。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和共产党号召，作为共青团员有责任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们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却说：“你们不认罪，就不分配。”同时，系领导看我们白拿着助学金，就叫我们帮系里画教学用的立体挂图。我们仍然满怀热情努力工作，居然被系领导用小字报表扬。后来，这个表扬被留校工作的我向她提过意见的党支部书记看见了，她撕掉了表扬小字报说：“右派分子怎么可以得到革命人民的表扬？”

直到 1958 年 1 月，学生科给了我们最后通牒，如果再不签字认罪，就要停发助学金，就要赶出学校。这是把我们逼上绝路，



因为没有了这 24 元助学金，我们就要面对无法生存下去的危险。于是，被迫无奈，我们只能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在认罪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没过几天，我们被分配去了天津市机械局。其实，我们本应被分配到保密的火炮制造厂或研究所，只因我们被打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所以只能勉强发配到一般地方单位去。我们是人民用大量金钱培养的新中国第一批兵工专业人才，却不能对口为祖国效劳，惋惜之情，始终盘桓在我们心里。

我有时难免后悔，我写了我们被打成“右派”的导火线——给系党总支的那封信。但是，我更懊丧的是，系党总支的那封回信中的承诺，那个不准打击报复的承诺，曾使我备感温暖，而最后却证明成了空话。其实，我们两人绝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也相信，那些同我们朝夕相处五年的同学，心底也不会如此认识。

伍文煦在不分配工作的空闲，向他父母亲详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整个过程和这可怕的结果。这封信就像一柄利剑，扎中了他父母毫无瑕疵的心。而且，更令他们悲痛欲绝的，是他们的另外三个儿子，也分别在各地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善良的心，几乎被这从天而降的“人祸”彻底粉碎了。我们真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痛苦，以后的日子又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庆幸我没有把实情告诉我的父母。如果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会痛不欲生的。不久，到了 1958 年初，我的二哥和四哥，也是在劫难逃，都被打成了“右派”。

我们到天津市机械局报到后，被分配到了一家小机械工厂——天津市通用机械厂。不久，这个厂改建为生产水轮发电设备的天津发电设备厂。到厂后，我们半年多来在学校受冷落压